

 春风学术文库  
CHUNFENGXUESHUWENKU

# 在汉语中出生入死

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  
ZAI HANYU ZHONG CHUSHENGRUSI

王尧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 春风学术文库  
CHUNFENGXUESHUIWENKU

# 在汉语中出生入死

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

ZAI HANYU ZHONG CHUSHENGRUSI

王尧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王尧 2005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汉语中出生入死：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 / 王尧  
著. — 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5.1

(春风学术文库)

ISBN 7-5313-2878-X

I. 在… II. 王… III. 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—当代  
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0250 号

###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：110003

联系电话：024—23280599 购书热线：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：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：xuantu.chinachunfeng.net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---

幅面尺寸：145mm×210mm	印张：10.625 插页：2
字数：245 千字	印数：1—6 000 册
2005 年 1 月第 1 版	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：韩忠良	责任校对：潘晓春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	版式设计：马寄萍

---

定价：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：陈光  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 目 录

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散文创作

——余秋雨访谈录/1

优秀的作家都具有自己的写作面孔

——莫言访谈录/24

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

——李锐访谈录/67

优秀者是“一生都要肩负沉重的人”

——张炜访谈录/107

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

——余华访谈录/132

“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，你就复活了”

——史铁生访谈录/154

我的血管里面没有贵族的血液

——贾平凹访谈录/179

作家永远是通过写作在思考

——叶兆言访谈录/201

一部作品应该有知识分子立场

——尤凤伟访谈录/228

在妖化与美化之外的历史

——韩少功访谈录/247

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

——方方访谈录/269

小说的本质是“方法论”

——马原访谈录/291

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

真正高贵的能力

——铁凝访谈录/310

跋/335

# 余秋雨

访谈录

在汉语中出生入死

关于汉语写作的高端访谈

## 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散文创作

**王尧：**最近，我在思考、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一些问题时，颇有感触。具体到“文革文学”的研究，还有这几年由你的创作引发的一些争议，我觉得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。评论家与作家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沟通显然是重要的，尽管彼此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，甚至大相径庭，但应该有大致相同的规则与逻辑，否则很难对话。从研究的角度看，我觉得坚持历史原则，坚持学术立场是十分重要的，应当在学理层面上研究问题，这样我们也许能尽量避免“文革”话语的潜在影响。

**余秋雨：**谢谢你在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一些研究。我想，从非常严肃的、学理的角度对当代文化作出判断，是现在特别需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仅仅是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及时的、零碎的、情绪化的带有炒作意义的反映的话，那么，我们的转型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。我们都期待抵达良性的彼岸。此岸到彼岸难免风急浪高，但如果这个风急浪高超过一定的限度的话，我们能不能到达彼岸的问题就很大。所以，在此，我们就需要有非常冷静的头脑，公平的情怀来面对。我们需要

# 余秋雨

访谈录

渡口的思考者或者是船边的思考者，他讲的语言不一定很响亮，但同样可以引起别人的思考；还有是以公平、宁静的心态来思考学术问题，这个思考不一定要讲谁的好话或是坏话。我经常遇到这种情景，如果感觉到对我说的好话也带有某种炒作的话，我心里就非常不舒服；有时候听到非常严厉的批评，但批评者如果是从严肃的、学理的逻辑出发的，我就非常地尊敬，和这个人就一定能够对话，而且他所产生的一些疑问，我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明白。所以，我们要求的不是好话或是坏话，而是一种学理的态度。

**王尧：**这样我们就有了对话的前提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你好像只是在访谈时零星地说过一些关于散文创作的话，似乎没有作过整体的论述。这也很有趣，一些学者从事创作后还常常保持学者的惯性，对自己正在实践的文体喜欢作理论上的阐释；或者，一些作家在创作上有了成绩以后，也喜欢写些理论文章。从研究的角度看，创作者的创作谈或别的什么论述，对研究者有参考价值。我也重视作家的创作谈什么的，因为它能提供解读文本的一种角度；但在通常情况下我对这些东西又保持着警惕性，因为“说的”与“做的”往往是有区别的。

**余秋雨：**在散文创作问题上，我只是一个参与者，往往缺少发言权。一个人一旦投入一件事，他的思维方式、他的行为就使他失去了公平评判的可能性，所以，我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我进入哪一个领域的实践时，我就放弃哪一个领域的评论权。我过去有一段时间一直对戏剧有评论，戏剧界也非常重视我的评论，但是如果实实在在的作为一个戏剧的顾问或策划，或者编剧的话，这一行的评论权我就放弃了。这不是避嫌，因为我是在创作，创作必须进入自己的角色，因而也就有了一种片面，这种片面使我失去了公平地鸟瞰整个戏剧的资格。现在正好相反，有的人却认为你参与

了才有资格说，其实这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我的切身体会，所以对散文的批评、鸟瞰，包括我自己的散文作出了什么，有什么进退得失，肯定是批评家的理解要远远地超出我本人的理解，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，这个旁观者是以客观的、整体的、冷静的心态来思索的。

**王尧：**我理解你的这一立场，但我还是想听听你对“文化大散文”的看法。《文化苦旅》在《收获》上连载，以及知识出版社（沪）初版《文化苦旅》时，好像还没有“文化大散文”的提法。但这时候，批评界已出现文化散文（也有人表述为“学者散文”）之类的说法，后来出版社出版第二版《文化苦旅》的时候加了“文化大散文”的字样，“文化大散文”的提出当然首先是对一种创作现象或者一种文体的回应，出版社也有策划的意图。“文化大散文”是在散文创作处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，而且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品格，我最初持肯定的、赞赏的态度。但这几年，我对“文化大散文”创作中的一些现象是不赞同的，在一次研讨会上，我对“文化大散文”的模式化倾向、对作家做学者状考古状的角色提出了批评。一些作家不是由独特的生命体验，而是由常识、通识进入历史。应当说，“文化大散文”的危机已经暴露出来。这两年我对散文创作关注的热情有所减弱，读的比较多的一些思想文化随笔、学术随笔。

**余秋雨：**我想，中国一大半的评论是围绕着“概念”在转，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为一个概念在论证。这个概念一旦成立，它的内涵和外延有大量的不确定性，因此，争论就开始了，争论是面对着这个概念的框架，而这个概念本身不是一个实体。它是企图对一个实体进行概括的。譬如中国式的荒诞派，荒诞派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戏剧的一种，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荒诞派，什么是荒诞派等等，一连串的概念就出来了。所以我对“文化大散文”的争论也有类似的想法，

# 余秋雨

访谈录

散文研究成就高的人一定不会站在这个概念里面。这可以一下子就判断出一个人的功力。因为设定一个概念，再来争论这个概念，是低的层次，是幼稚的。所以我也就不再讨论“文化大散文”是什么、文化是什么。何谓“文化大散文”？散文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，哪一篇散文是非文化的？譬如印在我书上的“文化大散文”的字样，出版者也没有和我商量过，我也不知道，后来看到书才知道。如果对中国文化作宏观的、历史的评价的文章才叫“文化大散文”的话，《文化苦旅》显然就不是，因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我对早年的故乡的回忆，这完全没有文化思考。再譬如我在养病的时候对一枝梅花的想法，这完全没有文化思考。因此，“文化大散文”这个概念加给一本书是不符合的，加给其中的几篇似乎还可以，因此，有这个范畴就比较累。

**王尧：**对你的散文，我有一些基本的想法。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我曾提到过。我觉得：第一点，近百年的散文史，后半段逐渐开始萎缩，原先多元的格局开始消失，到六七十年代开始形成占主要地位的“杨朔模式”。我觉得你的散文的出现，基本上打破了这种格局，而且文体上也有了突破，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的。第二点，从80年代到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发生转换，经历了思想解放这个发展过程以后，8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开始获得自己的话语权，散文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。无疑，散文是个体性的，又是精神性的，它最贴近作家的心性因而也是朴素的。因此，我曾经提出一个命题，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。散文话语的转换就是转换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上来，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对人生、对历史、对社会、对文化的体悟。

**余秋雨：**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讲的“知识分子话语转化”这个概念，它不牵涉到评价高低的问题，而牵涉到我们亲身

经历的历史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欢天喜地或者很多灾难的童年和青年时代，我们自己也领受过一些灾难。到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，我们看到了好多毛病，也看到了人类学整体上的好多坐标，这时，我们的脑子里出现了自我的精神话语，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，而且，每天都在做。这个对吗？那个对吗？那个对吗？这个对吗？如果说我们在以前的年代只知道听老师的话，听领导的话，跟着做，只产生小小的怀疑，而且这小小的怀疑还不成气候，终于到了一个可以天天与自己精神对话的时代。就我个人来说，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住在上海东北郊的一个非常小的十三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，房子虽然非常小，但里面堆满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、黑格尔等人的书。那些日子里翻着这些书，设想着小窗外面的天地、外面的世界，逐步逐步地洗刷我们过去的无知，这个过程是自我的精神话语系统中的深刻对话，每天晚上都在进行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我说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天天晚上都工作到次日凌晨四点，看书、做读书笔记，我觉得每天都在与世界上最重要的灵魂对话，他们就是亚里士多德、黑格尔等人的灵魂。对话的结果，从第一成果来说，我的那些读书笔记变成了学术成果；从第二成果来说，无法在学术领域里写出的东西，由于我的精神话语还不断地进行，那就流露在我的散文里面。我的精神对话，一种是我晚上在小房间里进行的，另一种就是我把这个过程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强化系统化。这样一来，这种话语权就比较强悍了。我认为，多少年来的学术阅读，使我的话语基本上完成了精神转换的过程。所以我用自己的笔写散文的时候，我好像重新去了很多的学校。你刚才讲的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，我想不仅我个人这样，很多知识分子都做了。很多很多盏晚上不灭的灯，很多很多张在小路上徘徊的脸，很多苦恼、很多疑问、

# 余秋雨

访谈录

很多告别、很多结束、很多狂喜组合在一起，在短短几年里面最后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，这种新的精神状态觉得可以与别人交流，可以带动其他人一起来迎接我们民族的新时代，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显露出来了。当时好多同龄人的著作都有这种精神状态，只不过我用散文的方式把这种精神状态明确地表露出来了。所以这种话语转换，是群体性的。我很赞成你的这种说法。我只是要补充这一点，这个话语的转换是全民性质的、是民族精神的常态恢复。这也为类似的文章找到了以前很难有的、广泛的接受面。这也应该归功于我们这个话语转换的时代，是这个时代造成的，而不是某一个个人完成这种话语的转换。

**王尧：**在民族大背景下思考这样的问题扩展了散文的文体功能。我感觉到你在写作中是有明确的选择的，这种选择不仅重新确立了散文文体的不可替代性，而且扩展了知识分子思想的共鸣圈。这可以从你的作品在大陆和华文圈的影响看出。你的作品盗版都那么多。

**余秋雨：**这些年在学术研究和创作中，我选择了自己写作的方位。我们完全可以控诉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，如果我当初的写作用这种控诉的方式来写的话，今天一些人对我的态度就不会有了，但当时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。自从我看了从古希腊、古印度以来的所有人类文明史后，我觉得应该从更高的方位来看待中华文明的尊严和它的失落。中华文明遇到了两难，这两难就是“历史意志”和“文化伦理”。

**王尧：**“历史意志”与“文化伦理”的冲突构成了你创作的基本框架，是你的散文一以贯之的“知性”。我以为，当你在心灵深处深刻感受到这种冲突，为之痛苦时，你的散文就“出彩”了，就有动人心魄的力量。反过来，就比较牵强，现在不少人的散文特别是往“文化大散文”上靠的散文就有这样的毛病。痛苦

是产生的不是附会的。

**余秋雨：**就“历史意志”来说，总是有一个马鞭催着我们往前走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道德代价都要向前走，但还有“文化伦理”，很多文明古国必定有很多稳定的东西，它的尊严、它的稳定、它的令人不可侵犯的传统，这两者老是矛盾。“历史意志”更往前走了以后，我们中华文明往往失落了很多，如果“文化伦理”讲得过多的话，我们的步伐就显得很慢，步伐一慢，就成为一个不发展的尊严，而不发展的尊严往往不称为尊严，这就是中华文明本性的矛盾，可能其他文明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所以，我的《文化苦旅》的“苦”字就“苦”在这里。不是我走路苦，而是这种苦。

**王尧：**这是一种大痛苦。

**余秋雨：**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方位来谈，实际上触及到当时很多有文化思考的读者的隐隐约约的共同思考。我们在讲要保护文化资源的时候，必须要想到我们要大幅度地往前走，什么也不顾地往前走，走了一阵以后，发现我们不能什么也不顾，毕竟有许多文明的沉积。这样我们就一定会思考，这种思考就造成全民心底的隐隐约约的群体的体察，轻轻地挖掘，就会“哗”的一下，造成对话的气场，也就是某种对话的可能。这是我们大陆的人和海外的华人都要看这种文章的重要原因，不是看语言。我的语言也并不漂亮，只是干净而已，关键是找到了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。海外华人，他们的文化祖宗还是中华文明，他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中华文明遇到过许多的灾难，灾难以后又能够昂起头来慢慢地往前走。

**王尧：**我想这大概是你的散文其影响超越文体范围的原因。中华文明为什么老要遇到灾难？它的自尊是什么？但为什么它的自尊总是和它的灾难连在一起？在中华民族开始新的复兴时，一个人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，自然会引起大家的共鸣。

# 余秋雨

访谈录

**余秋雨：**我是从具体的文化人个人的角度来表达这样的思考。这样的思考获得了感性的认识，与读者沟通也不觉得抽象，也不觉得玄虚，他会觉得有脚可以踩的地盘，所以可以接受，我觉得这完全是特殊的社会转型期的民族学会思考以后的结果，其实和个人的本体和写作能力关系不是非常大。

**王尧：**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，你所说的实际上涉及到散文写作的一些关键问题。散文写作实际上不是技巧的问题，它涉及到知识分子的胸襟、学养、思想以及面对整个世界、反省自身的精神状态。我一直觉得，在散文中起作用的是学养而不是学问，是作为精神资源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支撑，而不是某种文化观的阐释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散文创作的突破不是纯粹的艺术问题。你的整个创作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东西，如果有“文化大散文”的话，这应该是它最主要的特征：你自己的情怀、文化观、价值判断，在人类整个文明史和精神史的坐标上，追问中华文明发展的问题。你的散文常常出现一些重大的思想文化命题和宏大的叙事，当然，这常常是以个案为基础的。我认为这就是你的散文有厚重感的重要原因，也使你的文章超越散文的范围的主要原因。这里，我想用文章来表述你的散文和散文之外的作品。

**余秋雨：**这是我多年以来从事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的结果。如果我没有进入这种学术研究和著作的过程，我也会有技术上的解放，也会写一手非常通顺的文章，也可能有的文字还比较美丽，因为我的生命是比较趋向于个性的，但总会缺少一个东西，缺少一种厚实的方位。厚实的方位是整体的方位而不是学问的方位，它是学问堆垒起来的一种高度。学问本身进入散文不是目的，但可以产生一种高度，这种高度是散文所需要的，这种高度的出现其实是许多苦活组成的。我当时是非常非常地庆幸，我在那段时间里作出了一个有意识的判断：我在五年时间里不在报纸上写文章，尽管稿约很

多，不参加一切的座谈会，也不参加一切社会活动，除了教书之外，就是把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大师们的思想整体上梳理一遍。这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，难度就是当时翻译的材料很少，我能阅读英文，但能力不高，要翻着字典一点一点地读。那些本来是希腊文、意大利文的作品，翻译成英文后就比较浅显了。现在的学者用不着这样了，可以通过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阅读，但当时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好的苦学的机会。翻译的过程使我对他们的思想、逻辑的认识程度要比现在深入得多。我感兴趣的是哲学背景和思维背景。我对中国、印度、日本等东方的国家也进行了梳理，加上西方的，我一共梳理了十四个国家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，这种梳理不仅仅是看，而且是写。与过去相比，我就获得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在对一种社会现象或是毛病及时的反省时，我总会在一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上解释它的得失利弊。当时年纪轻，记忆比较好。我总想这种情景如果亚里士多德、雨果、狄德罗、黑格尔等人遇到的话，他们会怎么说。在这样的高度上来写，人家就会觉得与经典性的散文或者个体传记的散文不一样，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尽量不掉到书袋里，不去卖弄。我的散文里，也有些引用，但你很少知道我在那些地方下了苦功。因此，我很庆幸当时好多年的苦学。在生命最不安分的年龄的所作所为使我受益匪浅，包括现在的《千年一叹》的全部的基础都在里面。

**王尧：**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一直强调一个作家需要由文化背景和学养来支撑，所以我非常反对散文作家职业化的做法，一旦散文写作职业化，就很成问题。这种支撑实际上是写作者的一种精神高度。有这样的高度，写作的自信、力度就来了，而现在相反的是，有了“文化大散文”以后，许多作家虽然很刻苦、很用功，但倒过来了，用散文的方式做学问状、做考古状，这是

# 余秋雨

访谈录

不成功的。

**余秋雨：**这一点你讲得一针见血。我的《文化苦旅》出版不久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。《解放日报》的记者采访我的时候，我当时就讲到，大家都误会了一点，以为学者散文、文化散文要有许多史料，做学术研究状。如果要写散文的话，他主要展现的一定是才情和灵气，那么他的散文写得不太好的几篇就是因为掉到学术里了。所以，我在答《解放日报》记者问的时候，就讲了这么一段话。越到后来，越是觉得如果我可以学术方式来表达的话，我一定不用散文方式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。学术方式往往是表达一些结论性的东西，但有很多文化问题是很难找到结论的，这其中又有一小部分牵动着我们的感情，这就比较适合写散文，写的时候又要有所变化。我并不赞成由于散文容易畅销，就把自己完全可以用学术方式来表现的问题变成散文。这样的话，既让学术贬值，也让散文贬值。我有一些文章可能由于我要透露一个问题，往往写成文章而不是散文。譬如我关于“小人”的文章，对“科举”的考察，肯定不是学术论文，也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。这是文章，比较宽松一点，我的一些文章，有时就是一篇社会评论，就是一个随感，这些很难说都是散文，大范围的散文也可以说。所以讲成文章就比较好，不要去把散文无限的扩大化，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散文。分类学总是随着文化的步伐前进的，不要给分类学家添很多麻烦。要有起码的疆界，但任何写作者不要为疆界活着。当时我有一种预感，所以就以一种景点为依托，避免程序化的方式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以多年的精神对话和我的学术写作为我拓展散文领域的准备，但我很快地找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基座，这就是精神的文化考察。因为，这一点可以避免学究气的、书斋式的文化方式，现在这方面我越来越强化。如

果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可以找到景点式的写作的话，我在《山居笔记》中则是考虑中国文化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，就去有意识地考察，到东北、到黄州等地。至于《千年一叹》，不完全是为了写散文，而是让我的文化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上，用生命的历险做基座，与以前用学术研究做基座相比就改变了，这对过于学术化的散文同行也可以做些参考，还是要寻找新的方位。这个身份不是我故意转换的，我觉得散文作者仅有一个基座不好，应该有其他的基座，或者是教师，或者是旅行者，或者是行政管理者，都可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看到像李政道等人的文章也是非常的好。看到这类文章，我就怀疑，散文创作一旦专业化就完了。所以现在，我就称自己是文化旅行者。

**王尧：**这样我们就提到你的千禧之旅和欧洲之旅。我们知道，过去我们许多文人和学者都是旅行家，你这样的一种身份的重新确立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种身份会不会带来这样几个变化：第一，会不会有了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新角度？第二，会不会对你的写作方式带来变化？

**余秋雨：**你提的问题非常好。第一个是对文明的重新思考，我们过去都是文本思考，这有它的局限。文本的来源往往是第三手、第四手、第五手观察的结果。我们一到现场以后，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，有一些事情发生过了。即使发生过了，它也留下了遗迹。你到了遗址比不到遗址要好得多，遗址也有价值，它留下了大量的信息。我们过去的文本太片面或是太错误。因此，我非常希望多去走一走。用生命和身心去交往，是一种神秘的过程。只有当一种文化对自己生命全方位笼罩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深刻了解这种文化是什么，这在文本里边是找不到的，我会永远地坚持这个立场。我努力地写我看到的東西。

# 余秋雨

## 访谈录

**王尧：**我想，你的《文化苦旅》其实就是由“书斋”转向“大地”的一个结果。我记得《文化苦旅》的序，曾经描述过人、历史、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在感觉，当时你着力想开掘的是“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”。但《千年一叹》的写作，又由“大地”转到“遗址”，写作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

**余秋雨：**写作方式发生变化是肯定的。《文化苦旅》中的不少散文在当时都写于甘肃的许多小旅馆，但那种感觉很好，和以前坐在我的书斋里写文章不一样了。写《山居笔记》的时候，我到了资料最完全的、最丰富的地方。写作需要开阔的视野，要了解大陆学者、台湾学者、海外学者对历史事件的理解，但大陆学者很难了解到海外学者的观点，海外学者也是同样如此。因此，最佳的汇集点是香港，所以我利用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机会，终于找到了我的资料库。当时住在一个在山边的教师宿舍里，所以就叫《山居笔记》。《千年一叹》写作方式的变化就更大了，既兴奋又劳累。每天走十几个小时，容易碰到危险的车路，回到灾难重重的宾馆，或者是险情重重的宾馆，所有的伙伴都睡觉了，而我在写，因为当天就要传送出去，好多报纸都在连载。又不能买书，不但无法找到，找到也读不懂。因此，对你的感受能力、表达能力和承受劳累的能力都是一种考验。从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的节目可以看到，有时我是坐在旅馆门口的石阶上写的，有时是在吉普车的车座上写的。但我明确表示所写的散文不修改，这种考验我觉得很好，可以刷掉故意的文笔，夸张的修饰。我过去的散文中，如果还有做学问、做文章的痕迹的话，《千年一叹》连做的可能都没有了，因为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。这种写作方式的改变，我相信读者能够理解。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价值就更高了，是现场写出来的，犹如船长的航海日记，价值肯定是高的。读者还是接受